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

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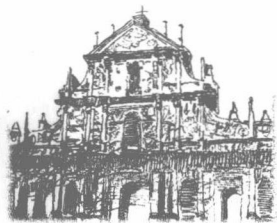
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澳門基金會
FUNDAÇÃO MACAU



澳门研究丛书  MACAU STUDIES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

Modern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in Macau, Hong Kong and Taiwan

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澳門基金會
FUNDAÇÃO MACA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朱寿桐, 黎湘萍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7
(澳门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2362 - 3

I. ①近… II. ①朱… ②黎… III. ①传播媒介 - 中国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②中国文学 - 文学研究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G206.2 - 53 ②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6362 号

· 澳门研究丛书 ·

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

主 编 / 朱寿桐 黎湘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刘 娟 汪明慧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班建武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293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362 - 3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这部书稿的书名有些特别。大陆以外的三块中国领地俗称港澳台或者台港澳，从来不需要说明排名先后的依据，大家约定俗成，顺理成章，似乎也无须说明为什么是港澳台或者是台港澳。我们这本书采用“澳港台”的排列法，多少有些拗口，可能还会引起某种尴尬的质疑，但绝对不是故弄玄虚或无聊弄词。最可靠的理由是，2009年筹备“近代公共媒体与港澳台文学经验”研讨会的时候，大家都同意用“澳港台”的排列，包括这个会议的另一个组织者黎湘萍教授。这样的考虑首先出于一般的情理，这个研讨会在澳门召开，由澳门出资，其核心议题以澳门打头符合人之常情。但我们想到的显然不是这些。澳门地方小，但澳门人绝不小气，更不会小气到与台湾、香港争排位的程度。这样一个学术指称应该包含一定的学理内涵。

那次令人难忘的会议，议题出自黎湘萍教授和台湾几位朋友的提议，突出媒体与文学经验的关系。而说到近代和公共媒体的话题，则应该而且必然从澳门说起。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不仅存在一个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而且存在一个从何说起的问题。说什么解决的是历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基本题材的问题，怎么说解决的是历史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问题，从何说起解决的是对研究对象及其外延的定位问题。倘若不能对研究对象及其外延作准确定位，所进行的研究可能会出现前提性的错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就非常敏感地存在一个从何说起的问题：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起还是从晚清文界革命说起，其结论会大不一样。中国的“近代”从鸦片战争说起还是更早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说起，体现着两种重要的历史观的差异，对于中国历史的近代性内涵的把握也会截然两样。近代性在中国意味着被动的开放性，现代性在中国则意味着主动的开放性。被动的开放历史从澳门开始，从葡国人以和平的方式进入澳门开始，随即，澳门成为西方宗教势力进入中国和东亚的通道，成为中华帝国被动地向西方的文化、宗教打开



国门的前沿门户。传教士在澳门受训，由澳门出发，进入广东、广西、福建、上海、天津、四川、陕西等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进入最冷僻的城市巷弄和最僻远的乡村民间，甚至于进入帝国的核心部位——清室宫廷。中国社会上下的文化心态面临着改变，生活方式面临着调整，甚至于政治格局也因此产生了某种影响。对于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与早先传入的西方宗教有直接关系。在这一意义上，一般认为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这实际上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应该说，没有西方宗教势力提前 300 年进入中国，将中国的国门一步步推开，鸦片的进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进入，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阵势与规模。因此，中国的近代，中国被动地向西方开放的近代性，应该从澳门说起。

在澳港台的特定区域，近代公共媒体也应该从澳门说起。近代公共媒体是西方文明渐入中国以后的产物，带着西方文明的精神和信息，是中西方文明交汇、互融以后的结果；而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交汇、交流，特别是开创近代文明的交流是从澳门开始的。诚如前文所言，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状况，澳门自明清以来一直是中国与西方接触、交流，西方了解和进入中国，中国瞭望和认知西方的最初窗口。作为西方文明的精神和信息的承载物，近代公共媒体在中国的兴起，势必从澳门说起。事实也是如此。澳门的邮政系统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土地上最早的通邮设施。西方传教士进入澳门以后，出于传教的目的，他们出版各种书籍，也包含一些连续性的出版物，客观上形成了近代公共媒体的雏形。有资料表明，中国土地上最早的报纸与澳门有密切的关系，循此，历史学的研究都可能揭示最早的电台势必与澳门有关。尽管这些媒体没有能够充分地反映在中国人的文学叙述当中，而且非常遗憾地也没有充分地体现在中国人的历史叙述之中。但这些事实不容忽略。因此，谈到近代以来的公共媒体，从澳门开始言说，是行得通的。

澳门的文学比起香港、台湾的文学，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数量都难以企及，成就也难以相提并论，著名作家、经典作品，几乎乏善可陈。澳门在汉语文学史上的地位因而相当边缘。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一般的文学研究而言，澳门文学（这还是一个扭扭捏捏、抖抖索索推出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的正式形成也已有了 20 多年的历史，但至今甚至在澳门，还有不肯承认



“澳门文学”的声音)能够忝列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之后,就已十分幸运,怎可以僭越到领头的位置?然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公共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在这样的话题上,澳门的公共媒体与澳门文学的关系与其他地区的文学以及那个地区的媒体之关系,应该处于对等的学术地位,而正如前面所说,公共媒体的论说,应该从澳门说起,那么,这样的话题从澳门说起,也未尝不可。这不仅仅是过去,就在当下,澳门公共媒体与文学的关系,仍然值得研究者关注。比方说,《澳门日报》每天都出版文学副刊《新园地》,另外还有其他文学评论性的、艺术欣赏性的专栏,澳门的其他报纸如《华侨报》、《市民日报》等也正常地保有它们的文学副刊。连同一些零散的出版物,以及澳门文学副刊,澳门每天所采用的作品量在70篇(首)左右,这在一个只有50万人口的城市是很难想象的:鉴于澳门没有专业作家,所有的写作者都是业余写作,假定一个业余写作者每周写出一篇作品(以一般专栏的出刊频率计),这就意味着,澳门正常有490人(次)在从事文学写作,经常性的作者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

这是一个相当密集的比例。这说明,澳门社会对于文学的兴趣,澳门媒体对于文学的重视,澳门文学在公共媒体所占有的比重,与香港、台湾,与整个大中华地区比较起来,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突出的文化现象。

其实就是从一般的文学话题而言,澳门文学也并非乏善可陈。澳门文学有自己的品格,甚至有自己的优势,它应该作为一个对象,而且是文学历史研究值得特别关注的特殊对象,这主要体现在它独有的文学生态。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态?我一般倾向于这样的描述:

澳门自由、开放以及相对逼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所有的文学事业通常在民间化、非意识形态化和非经典化的意义上进行,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生态,相对自然,迹近于文化原生态。文艺是一定人群自由地、审美地表达自己的情志能量的行为,就像体育是一定的人群自由地、审美地施展自己的身体能量的行为;这两个活动后来被引向竞技,引向极限型的比赛,是一种自我异化的结果。体育的原生态显然与竞技无关,文学的原生态也同样与作品的经典化、作家的明星化无关,它应该淹滞于民间,沉潜于个我,怡情悦性之外绽放各自的才情与魅力,以此体现不俗的趣味。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远离意识形态化的危险,才会远离被名利包装和戕害的危险;只有这样的文学才具有原生态的朴实与绚美。在整个汉语新文学的空间架构中,只有



澳门的文学呈现出这样的生态。因而它的个性价值非常突出，它在理论意义上具有烛照世界文学乃至世界文明的穿透力。

澳门文学的这种生态，很容易为外人所忽略，也很容易为文学评论界和文学研究界所漠视，因为它没有奉献出特别醒目的文学家，没有贡献出在整个汉语文学世界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由于在经典作品和代表作家方面澳门文学没有浮出历史地表的建树与崛起，汉语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描述往往会给澳门以经常的遗漏。事实不容颠覆，澳门文学确实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但这仅仅是在传统的文学批评视野中呈现的澳门。我们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太习惯于本着历史的优选法，将各个时代各个区域为历史优选出来的标本（作品和作家）放在一个理论的平台上进行比对，然后进行价值判断，甚至大排座次。这样的研究方法和习惯视路自然会遗忘澳门。我们应该明白，除了历史的优选法而外，文学研究还应该运用文化生态法：文学的运作除了推出经典化的作品和代表性的作家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灵、感情、梦幻和情致乃至趣味，让人们在一种约定俗成的写作平台和写作规则中进行一种全然放松的写作“运动”，各自倾吐性情，互相交流才情，聊以自娱娱人，借此怡情悦性，同时展示写作的才情与兴味。这不是一种相当理想的文学生息状态吗？

这应该就是文学的原本生态，也是较为健康的文学生态，只是因为人们的社会分工复杂化以后，文学创作事业同样受这种未必合理至少未必符合自然律的社会分工影响，被纳入了专家化的轨道，成为一门让少数人专擅的技艺。文学的运作于是朝着经典化的方向行进，无缘进入经典的文学行为和文学写作自然就遭到了淘汰。这种我们都非常熟悉也非常适应当然更非常认可的文学运作，确实催生了一代又一代了不起的文学杰作，但是否异化了文学生产的本质，是否偏离了文学应有的生态，是否违背了文学之于人类创造活动的原本命意？这确实值得我们从理论的环节和文明史的环节深长思之。

澳门在文学经典化的运作中，在许多人包括澳门文人自己看来，都可以说成就寥寥，乏善可陈。就在我们的这次会议上，一位资深的澳门文学家还是谦逊半是调侃地矢口否认澳门有文学。他那样调侃当然是从经典化运作层面说的。其实，从文学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意义上看，澳门不仅有文学，而且独特的文学历史形貌，体现着我们往往忽略了健康的、原生态意义上



的文学的区域标本。

澳门本来就有文学，而且还会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对它视而不见，是因为缺少相应的理论和历史眼光。从这一角度而言，在台港澳这三个区域，澳门文学给我们文学创作界和文学研究界提出的问题更为复杂。

写下这些，对诸位作者、编者和亲爱的读者多有得罪。请原谅本人“在澳言澳”的俗气。

朱寿桐

2011年10月10日

目 录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

- 从利玛窦、《四库全书》到上海世博会 杨 义 / 001
- 《知新报》与 19 世纪末澳门的公共性 张重岗 / 015
- 澳门 70 年代的文学景象与研究意义 傅天虹 / 025

同样的诗梦

- 《当代诗坛》与汉语新诗 朱寿桐 / 038

免滤的生命表达

- 2009 年澳门散文创作评述 荒 林 / 050

中国的“再疆域化”

- 19 世纪传教士的翻译 赵稀方 / 061
- 早期《申报》文人群体的新与旧 孟金蓉 / 086

晚清《圣经·诗篇》中译的文学化问题初探

- 以湛约翰《圣经·诗篇》中译本为中心 段怀清 / 099
- 新文学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嬗变 赵凌河 / 111

承传与变异

- 改版后的《香港文学》 计红芳 / 119
- 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 计璧瑞 / 127

当“旧小说”遇上“官报纸”：以《台湾日日新报》

- 李逸涛新闻小说《蛮花记》为分析场域 黄美娥 / 138



1920 年前后的期刊与台湾新文学的兴起

——以《台湾文艺丛志》和《台湾民报》系列为中心 朱双一 / 174

1960 年代的台湾“现代化”文化

——基于个人经验的回顾 吕正惠 / 200

90 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 古远清 / 208

汤英伸与《人间》杂志的理想主义实践 李 娜 / 217

《台湾文艺》与《中国文艺》之关联 杨红英 / 228

从纪录片《跳舞时代》看台湾日据时期流行歌曲

文化“现代化”的殖民性 李 晨 / 241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

——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张桃洲 / 252

西学东渐四百年祭

——从利玛窦、《四库全书》到上海世博会

杨 义*

一 四百年祭之三维度

今年5月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以利玛窦东来为标志，今年是西学东渐四百年祭。这是中华民族在严峻的挑战中磨炼和提升文化生命力的四百年。这是中华民族在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虽然中间插入一个清朝康乾盛世，但实际上在世界竞争中走了一条W形的曲线而逐渐衰落，终至全面复兴的400年。历史将自己的意义写在举世瞩目的沧桑巨变中。历史不会忘记，中国是在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进行这“西学东渐四百年祭”的。四百年一头连着利玛窦来华，一头连着上海世博会开幕，构筑起一座巨大的历史拱门，展示了中华民族艰难曲折又可歌可泣的历程，敞开了中华民族元气充沛又鹏程万里的天空。有意思的是，行程中间有一座碑，这就是出现在康乾盛世的《四库全书》。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这一历史事件告诉人们，四百年变迁的一个关键是中西文化的对撞、互渗、选择和融合。

利玛窦的价值在哪里？在于他是这四百年之始携西学入华，进行中西文化对话的标志性的第一人。利玛窦1582年8月7日进入澳门，1610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万历皇帝御准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坟地（今北京行政学院内）。碑铭是“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万历壬午年（万历十年，1582年）航海首入中华行教，万历庚子年（万历二十八年，岁杪已是1601年）来都，万历庚戌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在世五十九年（1552~1610），在

*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澳门大学中文学讲座教授。



会四十二年”。碑文采取汉文与拉丁文并列的方式，以表明其沟通中西文化的天主教传教士身份。

因此在今天澳门研讨会上探讨“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实际上是纪念以这位先驱者为标志的西学东渐四百年，反思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四百年。四百年前，利玛窦在澳门待了两年（1582～1583年），碑铭上称之为“航海首入中华”，然后在中国内地传教交友27年，传播基督教文化，同时学习儒家文化，剃发去髭，换上僧袍，又改穿儒服，愿当中国子民。1592年，利玛窦在南昌着手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注释。他由此开始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证明基督教与儒家有相通之处，盛赞孔子为“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者，使其“同胞断言他远比所有德高望重的人更神圣”。正是遵从这么一条入乡随俗、调适传教的温和的文化路线，利玛窦在肇庆被称为“利秀才”，在南昌被称为“利举人”，在北京被称为“利进士”，他的中文修养渐趋精深，获得愈来愈多的体面的认同。他翻译“四书”比王韬1862年在香港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布（James Legge）将“四书五经”译为英文早270年，成为中西文化缔缘的先驱者。

澳门在十六七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圣城”，由于葡萄牙国王握有天主教保教权，因而澳门被视为“东方梵蒂冈”，是中国人看取希腊、希伯来文化，尤其是文艺复兴早期文化的一个有历史关键意义的窗口。钱钟书说：“我常想，窗可以算是房屋的眼睛。”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门是让人出进的，窗打通了大自然与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光逗引进来，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窗口还可以放进小偷和情人。1582年，澳门这个窗口就放进了一个中西文化初恋期的情人利玛窦，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异样的色彩。

在考察“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他300年后的一位澳门邻居，也就是清朝末年杰出的维新改良思想家郑观应。郑氏历尽商海风波之后，1884年，也就是利玛窦离开澳门进入中国内地301年后，以32岁盛年退居澳门郑家大屋（距离利玛窦学习中文的圣保禄学院一公里开外），思考中国的前途和拯救中国的方法，写成《盛世危言》。该书对利玛窦颇存好感，称说“明季利马窦东来，徐光启舍宅为堂，有奏留其教之疏，实为华人人教之鼻祖。而明史称其清介，亦未因人教而受贬也”。这里提到的利玛窦的搭档徐光启，是晚明松江府上海县人，60岁后“冠带闲居”故里，试验农业，



著《农政全书》，身后归葬之地称徐家汇。他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文明的先驱者，徐氏之汇，汇向今日上海世博会所倡导的“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精神理念。郑观应《盛世危言》从商业富国的理念出发，主张“设博览会以励百工”，是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倡导上海办世博会的第一人。

《盛世危言》专设《赛会》章，给中国人的脑筋里增加了一根世博会的弦，它交代：“溯赛会之事，创之者英京伦敦，继之者法京巴黎，嗣后迭相举赛……萃万宝之精英，罗五洲之珍异……美人赛会于希加哥，其气象规模尤极天下之大观，为古今所未有……此会角九州万国之珍奇，备海瀕山陬之物产，非此不足以扩识见，励才能，振工商，兴利赖。”写《赛会》之时，适逢 1893 年美国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400 年”为主题，举办芝加哥世博会，盛况空前，其大道乐园启发了后来的迪斯尼乐园，爆米花、蓝带啤酒、麦片、口香糖刺激着饮食时尚。其时，美国的 GDP 已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面对一流大国的气象规模，郑观应心存忧患，反省“中国之商务衰矣，民力竭矣，国帑空矣”，进而警醒国人，“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以上海为中国率先举办世博会的最佳选址，是一个卓见，郑观应提示的世界之弦，牵引着中国振兴的百年之梦。有意思的是，有美国学者名为“华志建”者，把 1893 年芝加哥世博会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相比较，认为那届世博会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美国，而这届奥运会使美国人看中国的眼光，就像当年欧洲人看美国崛起一样，既震惊又怀疑。这样的话用在上海世博会，不是更有可比性吗？

这样，我们就清理出思考“西学东渐四百年祭”的三个维度：一是利玛窦—徐光启—上海；二是利玛窦—郑观应—世博会；另一个维度就是“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由于祭典的主题是东西文化的碰撞融合，这第三个维度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教训，它将引领我们走进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处。

二 把正史的眼光与皇帝的趣味放在一起反思

那么，历史是怎样记载利玛窦这个文化初恋情人呢？收入《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的《明史》，在《神宗本纪》中关于利玛窦只有一句话：“（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大西洋利玛窦进方物。”记载是记载了，但是与午门受



俘、灾民为盗、群臣请罢矿税并列，他显得并不特别打眼，反而有几分冷漠。冷漠的语言背后，却隐藏着这位传教士文化情人所带来的令人眼睛发亮的定情物（信物）和嫁妆。

1601年1月27日，利玛窦以“大西洋陪臣”的身份，依靠澳门资助，进贡了天主像、圣母像、天主经、《万国舆图》、大小自鸣钟、三棱镜、大西洋琴和玻璃镜等方物。（顺便说一句，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邀请苏绣圣手沈寿挥动神针，用110种颜色的丝线绣成《耶稣像》参赛，荣获金奖，实现了西方宗教与华夏工艺的完美结合。这是利玛窦所进贡的方物，耶稣像进入中国300年后，逐渐带上了中国色彩。）在利玛窦进献的方物中，万历皇帝对自鸣钟尤为痴迷，将其保藏在大内建筑钟楼之中，玩赏得不亦乐乎，还专门选派太监向传教士学习管理操作知识，多次诏请传教士入宫修理。皇帝好钟表，全然为了解闷猎奇，以消解寂寞。皇太后也想要欣赏自鸣钟，但皇帝却让太监弄松发条，不让太后使用，为了能自己留下来长久使用，把“以孝治国”都丢在脑后了。利玛窦与自鸣钟简直有一种生死情缘，直到解放前的上海，利玛窦还被供奉为钟表行业（还有客栈）的祖师爷，可见自鸣钟着实是个了不起的洋玩意儿，但皇帝老子却没有安排相关部门仔细研究它的精密原理，进而借鉴制造，只知享受文明，不思创造文明。至于世界地图，他也只是复制分赠给皇子们，让他们挂在墙上作为奇异的图画来欣赏。而对于世界地图蕴涵着多少未知的可开发的领域，对于其他珍宝所蕴涵的光学原理和机械制造之利，王朝决策者蒙蒙然毫无用心。当万历皇帝只不过把这些“方物”当玩物的时候，潜在着的取法西方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在老大的帝国的嬉皮笑脸下无声无息地滑走了。耽逸乐而废国策，到头来造成大国沉沦，实在足以令人发出千古一叹。

然而，利玛窦进贡的礼品所蕴涵的科技价值，还是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深刻的精神震撼。这位传教士文化情人带来的贡物嫁妆中，最抢目、最使中国士人精神震撼的是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地图取名于《易传》“坤为大舆”，坤为地、为母，为人类驰骋发展的大车，隐喻大地孕育滋生万物。利玛窦所作《万国全图·总论》中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它震撼着中国文化精英脑袋里根深蒂固的“天圆地方”的天地模式，使人们猛然惊异于世界之大，有五大洲，中国仅是万国之一，并不等于自己整天盘算着“治国平天下”的那个



“天下”。地球的这边那边都可以站人，脚对脚，也不会甩出去，简直不可思议。利玛窦的地球中心说，属于托勒密系统，未能汲取哥白尼学说，但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已起了颠覆的作用。它将中国画在地图中央，左为欧洲、非洲，右为南北美洲，投合了中国人的中心意识，这种布局在中国地图学中沿用了400年。这种新的世界观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一个无穷的未知空间，长久地刺激着人们的求知欲望，地理视野因而转化为一种崭新的文化视野。

《明史·神宗本纪》只用一句话来描述利玛窦，这意味着他与王朝政治无多大关系。与之不同的是，《外国列传》中几乎把利玛窦等同于大西洋意大利，用了千余字，称述“意大里亚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乃墨瓦腊泥加州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这是可以动摇中国传统以本国为中心、环以四夷的天下观的。撰写《外国列传》者，是清朝康熙年间由博学鸿儒科而成为翰林的浙江通儒毛奇龄，他对于利玛窦通过宦官“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是不敢苟同的。毛奇龄认为，以为古书未载的就不存在，是最不通的，“六经”无“髭髯”二字，并不等于说中国人的胡子是汉朝以后才长出来的。因此他推断利玛窦“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但《外国列传》不排除是经过史馆总裁官修改定稿，其中也有官方口吻的担忧：“自利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自利玛窦东来后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不过该书编纂者多为东南文士，他们毕竟还是感染西学东渐的气息，因此行文还是采取分析态度，指出“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时着声中土”。其实，大地是否为球体，世界是否有五大洲，并非书斋里的推理问题，中国人应该迈开双脚，到世界五大洲去实地考察，去证实，去发现。当上海世博会迎来全球240多个参展国和国际组织，从而成为空前规模的世博会的时候，谁还会怀疑世界有五大洲？对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我们不再会怀疑其真伪，只会发现其粗疏了。



《明史》馆臣属于康熙、雍正朝的文士，在其视野中，利玛窦主要给中国带来了两样大西洋异物，一是世界地图，虽然世界地图打开中国人看世界的视界，但他们还是感到“荒渺莫考”；二是天主教，虽然个人聪明特达，不求利禄，但其“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他们担心天主教会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安全造成危害。正史对于西洋天文、历算之学，还是欢迎的，如《明史·天文志》说：“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正史对利玛窦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行为的反应，蕴涵着交织的开放意识和警戒意识，这是西学东渐初期根基深厚的中国正统文化系统的反应。但是，透过一层思考，这种过分自持的文化反应，无异于以管窥天，难以在科学技术领域掀起轩然大波。人家有巨浪，你却无大波，累之以日月，老祖宗的本钱也会被吃光的。“荒渺莫考”的西洋科技和工业，距离17世纪的东方古国似乎太遥远了，它只在有限的人群中呈露星星点点，加之又无国家意志的推助，因此难以激发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三 《四库全书》之副册、另册

那么康熙、雍正以后再过半个世纪，到了18世纪的乾隆朝，情形又如何呢？利玛窦传播西方文化，即所谓基督教远征中国之行，引起的最集中的反应是遭遇160年后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由一批儒者、汉学家集体完成的乾隆钦定的国家工程，以乾嘉考据学的功力在其《总目提要》中展示了数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学术文化史。它是以中华帝国官方正统的文化眼光审视利玛窦的传教行为及其带来的西洋文化的。它自有一种规范，它以一种内蕴的价值观，通过立体的、等级的目录学体系，以及对群书的分类定位、著录提要、存目或禁毁，来判别它们的正邪、优劣的文化价值等级。利玛窦的中文著译存世者在20种以上，收入《四库全书》的有4种，未收而存目者6种。收录的4种为《乾坤体义》、《测量法义》、《圜容较义》、《几何原本》，这些都收入子部算法类。存目6种为《辨学遗牍》、《二十五言》、《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交友论》、《天学初函》，这些都归入子部杂家类存目。如果说，《四库全书》也如《红楼梦》太虚幻境中的册子，有正册、副册，再加上另册，那么从以上对利玛窦中文著作的



处理方式来看，它们未入正册，天文算法类书入了副册，传播教义类书则入了另册。这就是西学东渐初期中国文化的对话姿态和西方文化的命运。当你把别人的文化归档时，你自身的文化前行的姿态和命运反过来也被归了档，“归档者反被归档”，这就是文化对话蕴涵着的一种历史哲学。

在使中西文化联姻的过程中，利玛窦这位传教士碰上了一种前所未遇的古老而深厚的东方文明。他不可能像对某些所谓“蛮族”那样，面对文化空洞高傲地大肆传教，他面对的是一个丰足而儒雅的民族，因此，他必须使自己也变得儒雅而不鄙陋，必须调适自己的文化态度、传教方式和文化交流方式，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这个古老深厚的文化体制中获得受人尊重的身份。中国对他感到陌生，他对中国也感到陌生。他想对中国文化施以压力，中国文化也对他施以反压力，相互之间都有一个文化辨析、认知和选择对话方式的过程。有一种所谓的“利玛窦判断”，他发现中国所存在的东方人文主义的特点在于宗教不发达，没有完备的神学，有的只有道德哲学。这使他对基督教东征之旅抱有信心，又对东方的道德信仰心存畏惧，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面对东方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他不能显出鄙陋，于是搬出天文算法这类西学的优长，他甚至一再敦促罗马教会增派一些精于天文星相的教友来华，以备中国皇帝每年编修历法的咨询，以获得中国学者的青睐。《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收入利玛窦的四种书都被评价为实用之学。《四库总目·子部总叙》说：“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天文算法类放在医家和术数之间，属于实用之学，而不是纲纪之学。西方的天文算法这类科技著作，被嵌镶在中国儒学的学术价值框架之中，受到了格式化的处置。这套框架是由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具体设计的，带有北方学术宗师的典重的规范性。

这里，我们从天文算法类中，选择利玛窦两部书的提要来加以考察。其一是《乾坤体义》，属于自然哲学著作。上卷讨论地球和天体构造，以及地球和五星相互关系之原理；下卷列举几何题18道，用来证明：在数学图形中间，圆形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比一切图形都完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〇六评述说：“《乾坤体义》二卷，明利玛窦撰。利玛窦，西洋人，万历中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书，皆华字华语，不烦译释。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